

引用:苗媛媛.系统哲学观下中医药海外传播的多元人文路径[J].中医药导报,2025,31(6):1-6.



# 系统哲学观下中医药海外传播的多元人文路径<sup>\*</sup>

苗媛媛

(广州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系统哲学观强调任何系统都是多要素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具有全局性、关联性、动态性、有序性等特点。中医药的海外传播是一个复杂、开放且动态的系统工程。基于系统哲学观从整体着手来研究中医药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在融合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翻译学、文学、传播学等多学科视角的基础上,提出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6种人文路径:以“他者”视角为镜子;以语言学为元工具;以中医药文化符号为先行者;以典籍翻译为桥梁;以文学为蹊径;以媒介融合为助力。并基于系统哲学观对6种路径的合力作用及整体构建进行探讨,以期为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打开一幅更为广阔的多元化人文视野。

**[关键词]** 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系统哲学观;人文路径

**[中图分类号]** R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51X(2025)06-0001-06

DOI:10.13862/j.cn43-1446/r.20250527.001

The Pluralistic Humanistic Paths for the Overseas Commun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atic Philosophy

MIAO Yuanyuan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atic philosophy emphasizes that any system is a unified whole with multiple organically connected elements, characterized by holism, relevance, dynamism, and orderliness.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s a complex, open, and dynamic systematic proje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trategies for the "going-out" of TCM culture from an overall perspective based on systematic philosophy. By integrating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such as anthropology, linguistics, semiotics, translation studies,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six humanistic pathways for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TCM culture are proposed, including using the "other" perspective as a mirror, employing linguistics as a meta-tool, taking TCM cultural symbols as pioneers, leveraging classical translation as a bridge, utilizing literature as a path, and employing media convergence as a facilitator. Furthermor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atic philosophy, the synergistic effects and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these six pathways are discussed, aiming to open up a broader and more diversified humanistic horizon for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TCM culture.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systemic philosophy; humanistic pathways

中医药是科学与文化的结合,具有很强的文化属性,是

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特有文化物事。这一特性也凸显了从人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2021年度规划课题(2021GZGJ97);广东省2023年度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教育专项);广州中医药大学2023年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中医英语翻译教学与思政教育融合的路径研究”;广州中医药大学2024年度人文培育项目(2024ZXPY16);广州中医药大学2024年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中医英译课程思政建设的深度策略研究”

文视角研究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目前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大多是以工具理性的形式,即医学科学来进行对外输出,其文化形式的传播,比如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哲学思维往往被忽视。文献检索可见,有众多文章分别从翻译学、语言学、传播学、教育学等学科对中医的海外传播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但鲜有研究从系统哲学的角度综合这些学科进行深入探讨,为此笔者着重于中医药海外传播的人文视角研究,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融合语言学、符号学、文学、翻译学、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探讨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6种人文路径。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是一个复杂且动态的系统工程,多维度、多学科的合力作用对整个有机系统的建构有着更为积极的效果。

## 1 研究现状评述

1.1 国内研究现状 文献检索显示目前国内对于中医药的海外传播研究多停留于在某个学科范围内进行论述这种单学科范式上。如在翻译学视域下对中医典籍或术语基于不同翻译思想进行研究,对中医典籍的英译本进行历时和共时的分析研究,对国内外中医翻译学者翻译思想进行论述;或者从传播学的角度基于某个传播理论对中医药海外传播的方式、手段等进行分析;又或者在教育学范畴下对中医国际人才培养模式、学科建设等进行研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教育学、公共卫生学、翻译学、传播学。从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领域进行研究的还不多。将多个学科结合起来,以系统哲学观的视域进行审视,综合探讨多个学科、多元路径对于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合力作用的相关研究更是缺乏。

除了研究范式的单一性及缺乏学科融合,目前我国关于中医药人文社科领域的相关研究的国际显示度也比较低。在基于Web of Science平台的SSCI和A&HCI两大数据库中输入“中医药学”这一主题词进行检索,发现在2007—2022年间,全球范围内对中医药主题的关注持续升温,体现在相关论文被数据库收录的数量整体上呈增长趋势<sup>[1]</sup>。但从中医药人文学科领域的科研力量分布来看,发文最多的国家是美国,中国的中医药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发文量还较少,论文影响力整体偏低,学术研究实力仍比较薄弱。可见,中医药人文学科领域,我国目前整体参与度和显示度较低,这不利于中医药人文社科领域构建学术话语权。

1.2 国外研究现状 中医药在海外传播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汉唐之际。然而由于中医学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基因中,与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思维体系差别巨大,中医药的海外传播历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起初,主要围绕中国这一中心,向邻近的文化圈国家扩散;随后,在15世纪初至明末清初期间,中医药文化的影响力远及西亚、北非等远方地域;直至20世纪初,中医药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开来<sup>[2]</sup>。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外对中医药的研究开始出现了研究方向的转变,由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中医药的临床疗效展开研究,逐步向人文社科领域渗透和拓展。如对海外中医英译史进行梳理,有翻译学者英译了诸多中医经典著作,代表人物如文树德、魏迺杰等;有研究对海外中医学术名家的中医翻译思想<sup>[3-9]</sup>、

叙事特征<sup>[10-12]</sup>等进行论述,但研究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不强,并未触及中医研究的深层次学术精髓。在西方学术领域,历史学和人类学是对中医进行探究最为深入的两大领域。在研究实践中,逐渐衍生出诸如人类学视角、医学历史研究、医学人类学分析、医学哲学探讨、训诂学解读及文献学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和路径<sup>[13-14]</sup>,如: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是欧洲中医史学领域的先驱者;美国科技史学家席文,专注于医案、宗教、仪式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研究;美国学者凯博文,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对中医药进行了深入的跨文化研究。这些学者都是该领域的杰出代表人物。

综上所述,国际学术领域目前对于中医药的研究仍相对集中在对其医学本性及科学性的探索,如中医药的临床疗效及药理探索研究,而对其人文属性的研究仍相对滞后,尤其是我国基于人文社科视角对中医药进行研究的国际显示度还很低,还未能将中医药所蕴含的文化思维特性有效地传播出去。国内外关于中医药传播的人文领域研究多是以单学科的范式进行,将这些学科和维度结合起来进行融会贯通探讨的尚不多见。中医药的海外传播是一个动态且复杂的系统工程,它要求人们运用多维度、跨学科的思维方式<sup>[15]</sup>,来深入关注并评估其传播的实际效果。为此本研究将融合语言学、符号学、文学、翻译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来建构中医药海外传播的多种人文路径。

## 2 系统哲学观

美籍奥地利学者贝塔朗菲指出:“系统是处于一定相互联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成分的总体。”<sup>[16]</sup>“系统哲学,即由于将‘系统’作为一个新的科学范例引进后在思想和世界观上的重新定向。和每一种范围较大的科学理论一样,一般系统论有它的‘超科学’或哲学性的方面。”<sup>[17]</sup>该思想在世界哲学界与思想界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系统是物质世界存在的基本方式和根本属性,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以看成一个系统。任何系统均为多系统、多要素相互关联、有机统一的整体,具备全局性、关联性、动态性和有序性等特征。系统思维强调“多”与“整体”,旨在追求整体优化。它构成了人们分析和处理事物的基本出发点与核心思想。运用系统方法,可以从整体上深入研究中医药文化“走出去”的战略问题,这要求我们“根据功能、联系及相互关系来思考问题”<sup>[18]</sup>。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是一个开放、动态且持续联系的系统工程,它促使人们采用多元化的系统思维,从多个研究角度审视中医药的传播。

## 3 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的多元人文路径

3.1 以“他者”视角为借鉴 区别于基于自我的原生态的中医研究视角,中医作为被研究对象,在西方学者眼中呈现为一系列异质的思想和实践,是不折不扣的“他者”<sup>[19]</sup>。这种“他者”虽潜含着以西方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但对其的理解与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更好地帮助理解和认识自我。文树德,西方著名的汉学家、医史学家,他提出:“西方现代医学并不是作为一套根本相异的概念和实践体系进入中国的;当其与中医相遇时,它似乎遇到了自己的前身。另一方面,中医也完

完全可以将西方现代医学视为自己的某些内在原则的自然结果。”<sup>[19]</sup>西方学界对待中医的他者视角,能够激起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也成就了中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延展<sup>[20]</sup>。

基于“他者”视角展开的中医研究历史悠久,自明清时期起,传教士在中国境内传播西医的同时,也被动地将中医进行了译介。为全面深入地探究这一领域,可以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研究,包括但不限于探讨“他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医研究的共性、特性,以及背后隐藏的价值倾向;同时,也应关注当代知名汉学家的中医翻译实践及提出的中医翻译思想。

此外,海外图书馆及亚马逊平台提供了直观、动态且全面的窗口,以了解“他者”视角下的中医药观。如亚马逊平台在售的中医药书籍中,临床、预防养生、基础理论和中药方剂等方面备受关注,高频关键词涉及不孕不育、精神健康、压力、针灸和拔罐等,这反映出海外读者寻求中医的主要目的是弥补西医的不足。值得注意的是,在前200本最受关注的书籍中,74%的作者为英语本族语者,这表明海外本土作者的中医药著作更易被接受<sup>[21]</sup>。

因此,为提升中医药的国际影响力,可以加强国内中医药专家与国外作者的合作,以临床和养生内容为着力点,共同创作更多高质量的中医药著作,并加大向海外的输出力度。要使中医药所蕴含的中国特质文化和思维方式走进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提升世界不同文化对中医内涵的认知深度,就需要用西方社会看得懂的方法、听得懂的语言来讲故事。西方社会对中医的多维度研究无疑有力推动了中医的国际化进程,它打破了原生态中医研究模式框架,提升了卓有意义的海外本土化理论与观点,对当代西方社会认识、认可传统中医,特别是中医文化意义深远<sup>[18]</sup>。

**3.2 以语言学为元工具** 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提出一系列主张和经验,特别是将中医药参与到抗击疫情的实践写入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中,使中医药相关话语的研究进一步受到国际关注。可以窥见,后疫情时代关于中医药的新话语已经逐渐涌现,并直接参与影响着健康话语、疫情动态话语、国家政策话语及国际关系话语等主导话语的构建<sup>[22]</sup>。中医药文化在海外传播中,其话语权的全面构建已成为推动中医药文化“国际化”战略中亟须解决的重要理论与实际挑战。

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话语权建构的重中之重是中医术语话语体系的构建。然而,当前中医药术语的翻译面临着一些问题,如:过分注重技巧而忽视理论,缺乏多版本系统的比较,以及从传播和接受角度对术语翻译的分析不足<sup>[23]</sup>。为改进这一状况,应积极推动中医药术语翻译的跨学科研究,融合翻译学、语言学、传播学、术语学等领域的理论,加强中医药双语术语库的建设<sup>[24]</sup>。通过运用语料库技术和实施实证研究,才能对中医药术语翻译在海外被接纳和应用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分析。以此来构建一个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被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接受的中医药术语话语体系。

功能语言学将语言与特定活动相联系的内容定义为其概念意义,即话语的主题。对话语主题的研究不仅可反映出对说话人语言及认知的分析,也可以折射到话语表达与社会文化存在的内部关联。我们要进一步厘清概念意义的场域,中医药参与抗击疫情这种新场域的变化也要求提升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话语权的共时性,即研究构成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体系中话语各要素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因为中医药文化在海外传播的过程中,其话语体系的建立实质上就是获得海外认同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从浅层次(如人、财、器、药物、技术等)逐步深入到中层次(如价值观念、规范、习俗等),并最终达到深层次(如价值体系、文化精髓、思维方式等)的传播<sup>[25]</sup>。因此,我们需要发掘中医药文化自身话语的价值共通性(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其核心价值都在于救治病患,通过医学实践满足人们的健康需求)及功能上的互补性(中医强调整体性、经验和象形思维,而西医则侧重于局部性、推理和逻辑思维),以此来降低中医药文化进入其他文化领域时所面临的情感阻力和文化障碍,从而推动中医药文化在海外传播中的空间拓展和领域转换,纠正西方世界对中医药文化长期存在的否定、偏见,进而消除中医药是伪科学的歧视话语。

**3.3 以中医药文化符号为先行者** 从语言符号学的维度来探究中医语言符号的内在规律与特性,能够为中医的规范化研究、强化中医的话语影响力以及促进其国际传播提供坚实的支撑。“符号的科学”这一概念以人类文化为探究的核心领域,对意义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展现出强大的阐释能力,并且具备跨学科、广泛覆盖等显著特点,为各个学科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元语言框架。

中医语言符号的规律、特点,包括中医学中的很多概念,以及对思维之间关系的表述都可以引入语言符号学的相关理论来增强阐释力和理解力,如6种经络、6种脏腑、六气、6个症候群、太极、气功等,从符号学的意义来讲就是“太阳”“太阴”等符号所传达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sup>[26]</sup>。加强中西医语言符号的对比研究,是促进两者平等交流的有效途径之一。要提升中医语言符号的阐释力和认知度,需关注两点:其一,要尽可能接近现代科技符号的普遍特性,即追求简洁、易懂、严谨且逻辑性强;其二,要具有广泛的认知价值,并能引发国外受众的心理共鸣,这类符号通常具有直观、具体、可视化的特点。在阐释中医文化符号时,采用视觉图像化的传播策略,如制作大型中医药文化纪录片或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城市文化品牌,可以有效增强其阐释力和可接受度。相较于文字和翻译等阐释方式,纪录片和城市文化品牌中的图像符号兼具自然化和再现事物特性的优势,结合国外受众喜爱的叙事技巧、视角和方式,能更高效地实现中医药文化符号的国际化表达,更好地讲述中医药的故事。总之,在海外推广中医药文化时,应当充分利用符号的引领作用,强化中医药文化符号的启动效果,以此激发相关文化知识的情境联想与心理预设,从而保证受众对文化符号意义的预期构建,进而优化跨文化传播效力。

3.4 以中医典籍译介为桥梁 中医文化的传播与翻译是一个彼此联系紧密的整体,中医典籍架起了中医思维和中医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中医典籍翻译虽然是当前中医药文化外宣的着力点,我国组织了“大中华文库”翻译工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对十余本中医药典籍进行了翻译,但这些书籍并没有走进国外普通大众的阅读范围,大多只能在图书馆束之高阁<sup>[24]</sup>。亚马逊及WorldCat全球馆藏信息数据显示:《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四大经典之首,其英译版本达16种之多,入选“大中华文库”的李照国译本海外馆藏量比国外学者如文树德、倪毛信的译本馆藏量则少之甚多;《难经》的5本英译本中仅有李照国一本为国内专家所译,其余4本均为海外背景的学者所译(文树德、Bob Flaws、Guettler Sue Ellen & Hua Dong、Henry C. Lu),且文树德译本亚马逊图书网站的评分人数最多,肯定评价最多,接受度较高<sup>[25]</sup>。《伤寒论》(魏迺杰全译本)曾被列为海外“伤寒”研究者必读作品之一,获得国际学者的关注最多,被引频次排列第一,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排名居首<sup>[26]</sup>。《脾胃论》的两个英译本中,相较于中国学者杨守忠译本(1993年版),美国学者Flaws Bob译本(2004年版)的全球馆藏数目较多,读者反馈和学术期刊评论较好<sup>[27]</sup>。相较于临床和养生等实践类内容,中医基础理论在国外的接受度本身就较低。因此,在推动承载着中医药深邃理论与价值体系的典籍对外输出时,必须采取更具针对性的策略。

笔者建议,中医典籍的翻译工作应加强中西译者的团队协作,秉持国际合作视野,积极联合本土的双语专家与海外汉学家、翻译家共同参与。这样的合作模式既能确保中医药文化的准确解读,满足译文的“合目的性”,又能充分发挥海外汉学家的母语文化优势,实现翻译的“合规律性”。

同时,还应建立健全海外翻译及出版的“赞助人”体系,充分利用国外知名商业出版社的资源和渠道进行推介。例如Paradigm Publications(美国)、Blue Poppy(美国)和Singing Dragon(英国)等出版社已具备丰厚的中医典籍译本出版经验。重视这些出版社的“自己人”效应,通过他们的助力,切实使中医典籍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跨越。

3.5 以中医药的文学书写为蹊径 文学不但具有审美及认同、教化、传承等社会功能,也架起了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交流的桥梁,它总能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走进读者的视线,进而走进读者的心底。文学路径对他者文化的传播往往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杜威·佛克马(Douwe W. Fokkema)认为文学阅读具有6种功能:认知功能、情感功能、劝说功能、交际和协作功能、元语言功能、审美功能<sup>[30]</sup>。对此孙圣忠<sup>[30]</sup>认为:“文学的劝说功能也不是靠简单的说教和政治口号式的表达来实现的,而是要利用各种艺术形式和手法来引起读者的共鸣,从而实现作者的意图,对读者产生影响。”因此,文学语境往往可以将异质文化在传播过程中遭遇的潜在抵制和排斥降到最低。比如美国的华裔文学作品就充当着中医外传的一个重要媒介与载体。谭恩美的《接骨师的女儿》(The Bonesetter's Daughter)、《灶神之妻》(The Kitechen God's Wife)、雷霆招的《喝一碗茶》(Eat a Bowl of Tea),林路德的《千金》(Thousand

Pieces of Gold)等,都娴熟地运用了中医文化符号来表征和阐释中国文化。

在文学作品的范畴内,中医药文化既可作为创作内容,也能成为写作策略。在文化空间背景下,意义的构建不仅依赖于内容本身,还离不开所采用的策略。相较于中医古籍中常出现的那些抽象、艰涩、难以理解的术语,文学作品中所展现的中医药文化则更加具体、形象且富有活力,具备出色的诠释性。如《红楼梦》是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描述中医药文化最为丰富的文本,其中既有中医理论医话,也有中医医案仿拟。英国汉学家David Hawkes(大卫·霍克斯)之译本中就保留了译文与原文的较高吻合度。如在霍克斯的笔下,对于“时气所感,热身被风扑了”这一中医式的病因描述,他先在句内增加了“attributed it to the weather”,用以明确指出发病与天气之间的关联。接着对“时气”进行了解释,译为“an inclement spring”,同时“热身”被译为“overheated”,“被风扑”则被细腻地描绘为“exposed to the wind”<sup>[31]</sup>。这样的翻译策略,不仅传递了中医对于外感疾病的独特认知,更让《红楼梦》中的“医”与“病”成为连接东西方医学文化的桥梁,使国外读者避无可避地从作者对日常生活的描写中感受到区别于西医的中医摄生保健治疗思想,从而获得对中医药文化的初步印象并进而上升到理性思维。

作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先锋,中医药的海外传播不仅依赖于中医典籍与研究专著的有力推广,还需借助医学相关文学作品润物细无声地沁润<sup>[32]</sup>。如同中医讲身体健康就要达到阴阳平衡,也即达到身体的“中庸”状态,文化之间的相处之道也并不是你存我亡的关系和消极的妥协与调和,而是两种文化走出二元对立的局面,建构新的话语方式,以达到“文化间的和谐共处”<sup>[33]</sup>。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对中医药文化的接受度有限,而文学作品中的中医药描绘则能开辟出一条促进中医外传的蹊径。

3.6 以媒介融合为助力 媒介融合,作为信息时代背景下一种媒介发展的新理念,呈现了各种媒介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sup>[34]</sup>。它综合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优势,从而实现了从单一技术层面到包括媒介功能、传播手段、组织结构等各要素的融合<sup>[34]</sup>。

在中医药文化传播中,一方面,充分运用新媒体、自媒体、融媒体等途径,加强传播的顶层设计和建设。新媒体以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为支撑,融合多个传统媒体的特点,并利用互联网开放的互动优势为用户带来海量信息和全方位立体的真实体验,具有“传播与更新速度快、成本低”,“信息量大、内容丰富”,“低成本全球传播”,“检索便捷”,“多媒体传播”,“超文本”和“互动性”七大特征<sup>[35]</sup>。另一方面,优化精选译介内容,整合完善传播内容,开发一批彰显中医药文化创意、承载中医药文化内涵的双语纪录片、抗疫故事、二次元动漫人物传记、数字化读物等新兴文化作品,如中医药文化纪录片《本草中国》就是成功传播的范例,国家可以此为鉴,组织拍摄系列纪录片,涉及在海外关注度较高的中医养生、食疗、针灸、拔罐、推拿等方面<sup>[36]</sup>,借助海外媒体如Facebook、YouTube、

Twitter、LinkedIn、Instagram等平台,通过点击、点赞、留言、评论、转发等方式,并融入文字、图片、超链接、小视频等对中医药知识进行多模态阐释,将中医药文化这一“高语境文化”转型为更好理解与接受的“低语境文化”。

#### 4 多元路径的整体建构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是一个系统工程,多元人文路径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路径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首先,要强化路径间的协同作用,例如,在构建中医药术语话语体系时,不仅要借鉴翻译学、语言学、传播学、术语学等相关理论,还应考虑如何与其他路径(如教育路径、媒体路径等)相结合,共同提升中医药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其次,深化各传播路径的具体内容,从多个维度进行细致考量。以“他者”视角为切入点,全面且多维度地梳理中医药海外传播史中的“他者”观点与视角,包括西方医学界、普通民众、媒体等不同群体的看法,旨在精准捕捉“他者”更为关注的中医药内容及传播形式。在此基础上,运用西方社会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及语言,生动讲述中医药的故事,以增强其吸引力和感染力。将语言学作为核心工具,致力于构建中医药文化在海外传播的话语权。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自身话语的价值共通性与功能互补性,实现从浅层次到深层次的广泛传播,进而提升中医药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再者,在海外推广中医药文化的过程中,需强化中医药文化符号的启动效果。通过精心设计的文化符号,激发受众对相关文化知识的情境联想与心理预设,从而确保受众能够准确构建文化符号的意义,进一步优化跨文化传播的效力。中医典籍作为传播中医药文化的重要桥梁,应努力扭转其传而不入的被动局面。通过典籍的广泛传播,为国外受众提供一个深入了解中医药文化的窗口。同时,文学作为中医药文化传播的一条蹊径。如何借助涉医文学作品中的中医描写,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构建国外读者对中医药文化的初步感知,并逐步引导其上升到理性思维层面。最后,在全球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充分利用媒介融合这一有力工具,发挥传统媒介与新媒介的综合优势,共同推动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每个路径的具体建设内容均需具备全面性和针对性,以确保中医药文化在海外传播过程中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此外,加强薄弱路径的建设。中医药海外传播的6种人文路径中,有些路径已有较多探讨和研究,如中医药文化、中医药典籍翻译等,但对语言学、文学路径的相关探讨尚比较薄弱,应给予加强。由于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形式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话语构建方面尚存在着很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对中医话语直接参与并影响到的后疫情动态话语、健康话语、国际关系话语及国家主权话语等目前难以做定量及定性分析,因此对该路径的建设将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医药文化的话语构建需要更加灵活和强化适应性,可加强对后疫情动态话语、健康话语、国际关系话语及国家主权话语等的研究,探索中医药文化如何更好地融入这些话语体系,提升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而关于中医

药海外传播的文学路径,目前仅查到少量文献,聚焦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及《红楼梦》中有关中医的内容,中译外文学作品以及其他国家的本土文学作品中是否有中医文化表征的描写,哪些作品有及有多少,以及通过什么文学手段来描写等也是亟待研究的问题。可以通过组织专题研讨会、资助研究项目等方式,吸引更多学者关注这些领域,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

最后,为了更好地整合多学科资源,推动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研究与实践,可以建立跨学科研究平台。该平台可以汇聚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共同开展研究工作,为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智力支持。同时加强与国际组织、国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可以通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合作研究项目等方式,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医药文化的了解和认同。

中医药文化“走出去”既要强调各路径的作用,更要强调各路径共同作用的整体质变效果<sup>[15]</sup>。以系统与辩证的观点把握部分之间及部分与整体间的关系,就需要我们在注重各路径整体合力的同时,也要对各个路径关注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和审视,对系统整体中的部分进行加强,同时对部分中的整体进行建构。

#### 5 结语

要实现中医药从“走出去”到“走进去”,不仅要研究其医学诊疗的科学性,对其人文属性的研究也不可或缺,而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国内外尚显不足。以“他者”视角为镜子,用西方社会看得懂的方法、听得懂的语言来讲故事;以语言学为元工具,基于传播和接受角度来构建中医术语的多系统版本,实现技巧理论并重;以文化符号为先行者,增强中医药文化符号的文化启动效应,形成对相关文化知识的语境激活和心理定势;以翻译为桥梁,加强中西译者的团队协作,重视国外出版社的“自己人”效应;以文学为蹊径,通过涉医文学作品中的中医书写润物细无声地编织国外读者对中医药文化的最初感知;以媒体融合为助力,综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独特优势。通过系统哲学观对上述6种人文路径进行整体构建,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必能开辟出一条从过去无主题、撒网式到以文化主流为先导,有目的、钓鱼式的多元输出路径。

#### 参考文献

- [1] 李海英,王尔亮,张宗明.海外中医药人文领域学术期刊发展现状研究:基于Web of ScienceTM平台的SSCI和A&HCI数据库[J].出版广角,2019(24):42-46.
- [2] 苗媛媛.国家翻译实践视角下中医翻译教学的国家意识培养[J].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2023,31(5):566-571.
- [3] 段天泽.德国汉学家文树德中医典籍翻译思想研究[J].中医药文化,2024,19(4):314-324.
- [4] 郑鸿桥.文树德中医隐喻式术语翻译思想探微[J].莆田学院学报,2023,30(3):79-85.
- [5] 张晶,吴青,王志杰.中医译家翻译思想研究的概况与思考[J].亚太传统医药,2018,14(9):85-87.

- [6] 杨丽雯.多元系统论视阈下魏迺杰中医翻译思想研究[D].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2015.
- [7] 陈晓华,施蕴中.从翻译目的论看Nigel Wiseman的中医英译翻译思想[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10(5):182-184.
- [8] 李照国.Nigel Wiseman的中医翻译思想评介[J].中国科技翻译,1998,11(2):41-43,51.
- [9] 李照国,李鼎.试论李约瑟的中医翻译思想[J].上海科技翻译,1997(2):21-22.
- [10] 刘刃,魏嘉纬,孟月,等.叙事医学实践对中医辨证行为的影响[J].中医杂志,2020,61(17):1521-1524.
- [11] 鲁艳辉.《黄帝内经》叙事医学文化特征[J].中医药导报,2019,25(10):23-26.
- [12] 孙畅.失眠患者临床特征及叙事医学中医平行病历构建[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7.
- [13] SIVIN 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M].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7.
- [14] 冯珠娣,艾理克,赖立里.文化人类学研究与中医[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1,24(6):4-9.
- [15] 魏泓.系统哲学观下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工程建构:以莫言作品为例[J].中华文化论坛,2016,5(7):55-61.
- [16] 刘建萍,刘宗波.从系统哲学角度解析生态文明思想[J].学术交流,2013(1):55-58.
- [17] 张华夏.系统辩证学的理论与实践[J].系统辩证学学报,1997,5(1):1-8.
- [18] 蒋辰雪,张树剑.欧美学者的中医人文研究回顾及其对中医海外传播的启示[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2):128-133.
- [19] 文树德,王聪.中医:历史与认识论的几点反思[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7(1):42-49.
- [20] 严暄暄,陈小平,何清湖.“他者”眼中的“他者”:浅谈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医[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33(2):24-26.
- [21] 缪立懿,吕颖.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现状与启示:基于亚马逊网站的图书数据分析[J].温州医科大学学报,2022,52(6):505-509.
- [22] 李战子.后疫情时代的功能语言学话语分析[J].外语研究,2020,37(5):1-6.
- [23] 蒋继彪.中医药术语翻译规范化再思考[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3,29(6):1004-1007.
- [24] 周恩,苏琳.中医药术语英译研究趋势、问题与展望[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22,42(6):754-759.
- [25] 毛志强,杨德辉.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话语权的整体性建构[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4):241-246.
- [26] 陈洪,刘家僖,何清湖,等.文化符号在中医药跨文化传播中的应用初探[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20,40(4):507-510.
- [27] 王尔亮.中医药典籍英译本的海外传播现状、困境与策略:以《难经》英译本为例[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4):7-12.
- [28] 张晨晨,谭业升.“中医西传”视域下《伤寒论》英译本的海外传播与接受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1,44(4):150-158.
- [29] 刘帅帅,李卓瑾,苏红.《脾胃论》英译本评述[J].中医药导报,2021,27(6):218-222.
- [30] 孙胜忠.质疑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的“唯文化批评”[J].外国文学,2007(3):82-88,127-128.
- [31] 杨星君.汉学家涉医文学翻译对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启示[J].亚太传统医药,2024,20(2):167-173.
- [32] 王小燕.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中医书写与中医药文化传播[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0,33(3):48-58.
- [33] POOL I D S. Technologies of Freedom[M].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9.
- [34] 李战子.话语分析与新媒体研究[J].当代修辞学,2016(4):46-55.
- [35] 李彪,王永祺.2017年媒介融合趋势:从单向度融合到多层次融合[J].出版广角,2018(3):20-23.
- [36] 邵延娜.基于5W传播模式的中医药文化海外译介研究[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23,25(8):178-181.

(收稿日期:2024-10-25 编辑:刘国华)